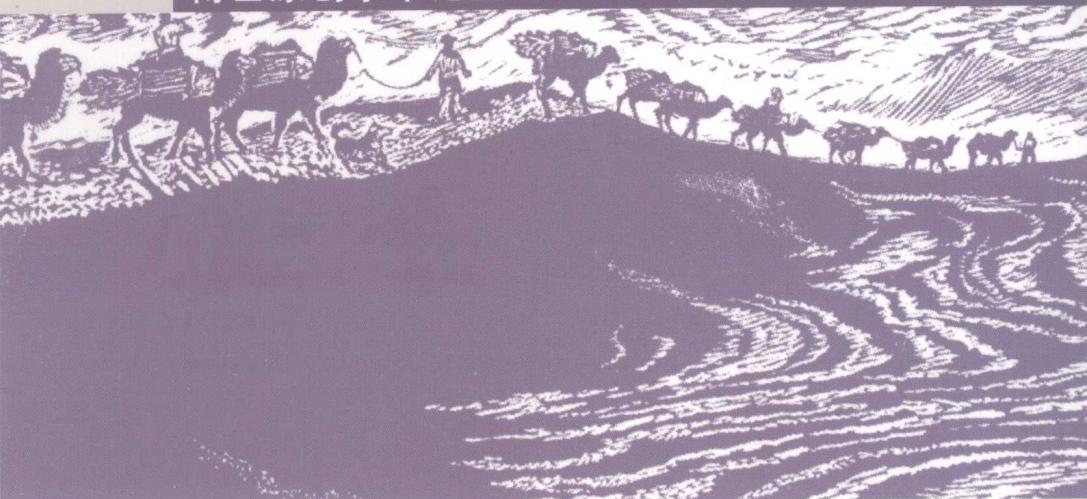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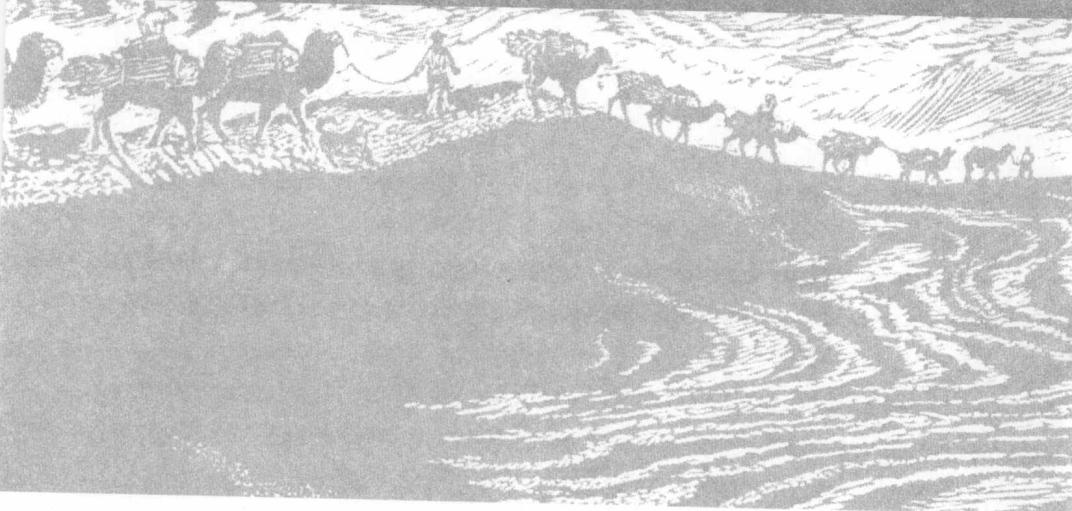
学府内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

杨蓉蓉/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



学府内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
杨蓉蓉/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府内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
新文学关系研究 / 杨蓉蓉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 7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
ISBN 978 - 7 - 80206 - 471 - 3

I. 学… II. 杨…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9638 号

学府内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

著 者：杨蓉蓉

责任编辑：崔允刚

封面版式：嘉海文化

责任校对：泓 达

责任印制：贺玉田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 - 67078234 (咨询)，67078235 (邮购)

传 真：010 - 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印 刷：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 装 订：北京富兴装订厂
开 本：880 × 1230 1/32 总 印 张：94
字 数：192 千字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
书 号：ISBN 978 - 7 - 80206 - 471 - 3

总 定 价：180.00 元 (全 9 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博士原创学术论丛

学术顾问

王元化 钱谷融
章培恒 范伯群

第一辑学术导师（按姓氏笔画排列）

吴立昌 吴定宇 周 斌
陈国恩 唐金海

第一辑主编

唐金海 陈国恩 周 斌

策 划

唐金海 郑荣来 黄丰文

总 序

唐金海

桌面上堆着厚厚两大叠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毕业论文，每一本都是沉甸甸的，每一本都工工整整，一式的封面“装帧”和编排格式，内容却涉及广泛，丰富多样，有历史小说或妇女形象的研究，也有左翼文论或作家作品的研究，有高校与文艺兴衰关系的研究，也有电影思想艺术的研究以及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文化渊源的研究。——可以想见，为了这些夯实而灵动的文字，为了自己的梦想，当年这些博士生们，在电脑前，在图书馆内，博览古今，搜索中外，剔误钩沉，冥思默想时的种种情景。他们耕耘于日夜，顿悟于晨梦：欢乐和痛苦、寂寞和兴奋、焦虑和激情。——三年如一日，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智慧。

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高校，师承于不同的导师，他们有不同的求学经历、治学风格和学识积累，他们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学审美价值观和学术个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论文（论著）也就轻重不同、厚薄不等——有的内容更厚重，有的立论更富朝气，有的选题更新颖，有的评析更透彻，有的挖掘更深远，有的视野更新潮。——但有一点却是入选论文的作者所共同考虑过的，也即是中外学术界和国家教委对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研究成果有无原创性？有哪些创新点？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学术含量如何？论证

分析有无说服力？是否符合学术规范？其理论与实际价值如何？

正是在这一基本点上，在独创性、原创性这一核心要求上，作者与负责任的导师一起，查阅史料，披沙拣金，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反复讨论，一再斟酌，才能最终决定选题中心，立下论文框架。其间，论文作者往往能焚膏继晷，独创新意、自出机杼；当然，也正是在与之相关的原创性的基本点上，有些论文还可有相当的回旋余地，还可有较多的言说的空间。——这也正是中外人文学者们尤为关注的话题。——学术的独创性和原创性，归根结底是一种治学精神的体现，是大凡具有、尊崇和向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学者们所应终生履行和追求的目标。当然，更应是正在行走于治学之路上的青年博士们终生履行和追求的目标。

也正是在独创性和原创性的话题上，学术界的讨论还不够充分，还不够深入，还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博士论文，又一次启发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毫无疑问，博士论文应该是学术论文。那么，学术论文的灵魂和生命是什么？中外文学史和文艺学史告诉我们，为什么成“百万”、上“千万”的论文或论著早就被历史的潮流席卷而去，仅有成“千”上“万”的论文（或论著）能世代相传，被奉为经典，并闪耀于学术史册？——西方的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伏尔泰的《论史诗》、狄德罗的《论戏剧艺术》、莱辛的《汉堡剧评》、歌德的《诗与真》、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序言》、左拉的《实验小说》、海涅的《论浪漫派》、杜勃罗留波夫的《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惠特曼的《<草叶集>序言》、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等等，中国的如《毛诗序》（作者有争议，略）、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

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袁宗道的《文论》上下篇、脂评《石头记》、刘熙载的《艺概》、梁启超的“三界”革命论、王国维的“境界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等等，——为什么这些论著、论文、学说能被尊为经典？自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的原因，它们也许并不全是完美无瑕、无可质疑的，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过千百年、数十年社会历史、文化史的冲击、风化和锻造，经过人类漫长生活实践的检验，它们依然在人类人文科学史上巍然屹立着，依然在熠熠生光——而使其“屹立”和“生光”的“基石”和“光源”，就是它们固有的原创性和独创性。

这种独创性和原创性，历来为中外众多大学者、理论家、作家所推崇。晋陆机《文赋》就说过，“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说的是艺术的创新；梁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也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梁萧子显说得很彻底：“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唐韩愈更是力主为文要“能自树立不因循”。（《昌黎先生文集·答刘正夫书》）西方亦然，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启蒙主义大诗人杨格曾说：“有独创性的作者的笔好像阿尔迷达的魔杖，从不毛的荒野里召唤出一个花香鸟语的春天。”（《论独创性的写作》，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十九世纪初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说得更明确，“创造就是创新。……批评应该在这种创造中意识到自己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顽强的创造力量”，如果文学批评家能赋予“这些重要的概念以生命，能够用呼吸托起它们”，“通过雄辩”、“通过精神”、“通过风格，给它们注入一种活力”，那他（她）就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六说文学批评·批评中的创造》，赵坚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89年版）

有关引文的用词和译语也许有所不同，有新意、创造、创新、独创、原创等之别，它们的色彩、分量、程度和外延也不尽相似，但它们原创性的基本内涵是相似的。何谓博士论文的原创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是否提出并论证了历史上或同时代学人从未论及到的新观点、新思想？

第二，是否提出他人尚未揭示的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固有内蕴？是否深化了他人的思想和艺术研究，将他人的审美观推进和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

第三，是不是提出并论证了他人没有涉足的文艺的新领域和新问题？

也许还可有更多的标准，但以上三点应是衡量人文科学类博士论文，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是否具有原创性的基本要求。但是，是不是初步达到上述要求，博士论文就可评为具有原创性了？学术研究史告诉我们，未必尽然。

“提出”、“揭示”新问题、新领域、新内蕴等固然是最基本的，还必须通过“学术拷量”，即论文的学术价值、学术方法、学术含量、学术论证、学术底蕴、学术规范如何？虽然日常的作家作品论或作品分析、思潮、社团等报章杂志评论，也要有“学术拷量”，但两者相较，因篇幅容量、读者对象、办刊宗旨等故，一般说来，对前者的“学术拷量”，要求应更为厚重稳健、更为全面严格、更为翔实周密。

何谓“学术拷量”？自然是多方面的，就当下的博士论文而言，首先要拷量的是，对论文的中心议题和原创点及其相关问题的“史”的把握和梳理，以及现状的了解，是否全面、准确和清晰？

其次是，充分可靠的史料与合理严密的论证是否融为一体？——既不是史料、引文的堆砌，也不是远离中心论点的空泛议论，也不是背离原材料故作惊人之语而生硬地将内涵题旨“拔高”？

仅就上述两点，绝非一年半载就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要积学多年、积劳敏思、伏案良久、寂寞经营才可望有成的。朱光潜先生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就是“在英法留学八年之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大英博物馆和学校的图书馆里，一边阅读，一边写作”而成的（《作者自传》，《朱光潜文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院写的毕业论文，题为《魏晋文论的发展》（本科论文）和《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研究生论文），就是在“国难频仍”，“伏案书斋”中写成的。其中收入《中古文学思想》一书的论文《小说与方术》，曾得朱自清先生赞誉：“非常精彩”。（杜秀《王瑶年表》，《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在对是否具有原创性的论文作了“学术拷量”之后，是否对论文原创性的拷量就已结束？任何学术论文的真正价值，都有至少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理论和当下时代层面上的，一是实践和历史时间层面上的。因此，论文真正的原创性既要经得起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和时代的拷量，又要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拷量：“站得住”吗？这与诺贝尔奖通常只对二、三十年前的优秀原创成果（论文或其它创造）颁奖的原因相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蔡元培、鲁迅、郁达夫、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为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分别写的“总序”和各集的“导言”，都是长短不一的具有原创性、独创性的学术论文，其中基本观点也要经受理论、实践、时代和历史的拷问：是否“站得

住”？我们只要看几位大家在导言中对现代文学（以及各种文体、思潮、理论）发生、发展复杂现象的纵横自如的精辟分析、对作家作品的精确评价、对若干史料、史实的搜罗和辨识等，以及论文中的很多观点时常被后来者引用等，——它们已历经近百年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拷量”和“检验”，已被作为经典文献永载学术史册。此外，文学研究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先例，有些论文发表时，曾因某种“原创”和“独到”的观点，在文坛引起过反响，甚至有轰动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势的发展变化，有些“独创”点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如钱玄同最激烈地“独创”“废汉文”、“废汉字”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等；有些“独创”点却既能回响于问世之际，又能闪亮于历史长河，历久弥新，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蔡元培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等。

上述论文长短不一，它们既是学术论文，又与当下论述的博士学位论文不完全相同，前者高度凝练、精警，思想和观点如千锤百炼而成的钢，后者中心也必须精粹，但内容多，范围广，有详细的“史”的梳理和丰富的论据和周密的论证分析。两者应有的共通之处是，——凡优秀的论文，都必须经得起“原创性拷量”和“学术性拷量”，以及在时代和历史的拷问中“站得住”：“历时性拷量”。

读案头的这些青年博士论文，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初期那些以国人命运为重、思想“前驱”、立论敏锐又时有偏激的前辈学人，——虽然历史前进了，时代大变了，当今不少青年学人也许不及前辈们那样的学贯中西、乐于奉献、执着静心、敢于

追求，但他们在自己的论文中表现出来的踏实、刻苦、钻研、智慧、探索、敏锐和独创的治学精神，还是让人感怀而赞叹的。当然，在追求原创性的学术道路上，他们时有偏激、时有失误，时有粗疏，甚至时有谬误，好在他们还很年轻，未来在他们的脚下，更可观的学术成果是世人屈指可盼的。

是为序，以求教于青年博士们和文坛贤达。

唐金海于复旦草堂

2007年6月15日

序

吴立昌

近一二十年来，大学教育和校史的研究，日益渐多，其中颇有涉及大学教育与新文学关系的内容，只是研究对象多为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名校，其它学校较少。上海自开埠至20世纪40年代末，现代的教育、文化、新闻出版事业一直跑在前面，二三十年代，更无可争议地成了全国文坛中心，可是，罕覩关于此时上海现代大学教育与新文学关系的研究，因此杨蓉蓉博士的《学府内外》就此专题所做的探索，确有补阙立功。

本书在汲取国内外教育学、文化学、社会学新的思维和方法的基础上，以新文学如何通过课程设置走进大学讲堂为线索，力图厘清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为了使这种关系具有“历史现场感”，就必须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而作为个案进行分析和论证的当时各有特色的三所大学，虽然复旦延续至今已成名校，但光华大学的印象却被人们逐渐淡忘，至于吴淞中国公学，因年代久远所知者更少，作者又特别重视它们的原始校刊校报，这就大大增加了收集的难度。然而，当很多别人不曾在意且多残破不全的“死”资料，如今经过作者的精心梳理和细致辨析而“活”了起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发现。

本坛授课，文坛著述，二坛互动，古已有之，外国亦不例外。虽然当年京派海派文人的境遇、势派向有差异，但身兼教授、作家、编辑等职于一身的情况仍较普遍，这不更有利于二坛

之间的沟通？教授不仅在教学中使“新文学能够以知识的形式传播出去……为社会所接受”，而且还能将自己参与文坛实践的经验融会于新文学课程教学之中。另一方面，学生在课堂接受教育的同时，又可通过校园文化活动（校刊、文学社团等）获得对文学的系统认识和浓厚兴趣，为日后走进文坛奠定基础。

二坛互动，过去是这样，现在同样如此，特别是这十几年间，除了执鞭本坛与握管文坛早已难解难分，还可见到另一种新气象，那就是一些资深的知名的作家登上大学讲坛（专职或兼职）传道授业解惑，一些青年作家则走进课堂攻读学位。作家出身的教授，可以使凝重的学苑更为鲜活；作家出身的学生既可在知识殿堂提升自己，又能在青春校园迸发活力。对教育对文学，这自然是一件“双赢”的大好事。当然，现行的大学教育体制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有待进一步改革；是出于对此不满，还是另有其它原因，文坛也有名人曾经对作家登上讲坛进入课堂不以为然，尤其对年青作家读研甚为反感，对指导他们的教授更是轻蔑有加，不屑一顾。后来这样的非议又没了，因为当事者也当上了可以带研究生的某名校教授，为二坛互动做贡献了。

本书为研究上海现代大学的文学教育与新文学的互动关系开了个好头，之后的研究空间还很大，不仅“五四”三十年上海仍有不少具有特色的大学与新文学的发展休戚相关，而且近五十多年来，随着时势的云谲波诡，二坛之间也“与时俱进”，呈现出非常复杂微妙的关系，耐人寻味，包括杨蓉蓉在内的有心人，倘若深究下去，定能“究”出更多新意来。

中文摘要

伴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大学成为现代知识生产的主要机构化场所。文学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学科，被纳入了现代大学体制。大学的文学教育成为文学知识生产、传播以及人才培养的主要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时代的文学走向。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制度，现代大学在新文学发生后对它的影响和“规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文根据已有研究成果，选取上海现代大学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力图回到具体“历史现场”，来探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进入发展期时，上海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何在。

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之间的联系，最直接莫过于新文学走进大学讲堂，成为大学中国文学系（简称国文系）教学中的一部分，新文学课程的设置对于考察现代大学与新文学关系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由于新文学并不是从一发生就走进大学讲堂的，因此，本文主要以新文学课程的设置为线索，选取了在课程设置考察中形象与意义最为突出的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和光华大学作为个案，来厘清新文学进入上海现代大学国文系讲堂的历史过程。此外，即使在新文学未进入大学讲堂之前，它也早已活跃于大学校园之中，此现象并不以大学是否设置新文学课程为转移。因此，本文在围绕新文学课程设置进行论述时，还以大学环境内的文学活动为第二条研究线索。根据以上两条线索，本文主要从：一、不同大学的办学方针、建校历史所形成的独特校园文化品格，及其决定的大学对待新文学的不同态度；二、不同大学的文

学教育活动，即大学国文系中新文学课程设置的情况，及围绕课程设置所展开的教学情况、教师情况和教材的编写及研究状况；三、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三方面来考察上海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

本文绪论部分主要提出研究对象、划定研究范围和明确研究方法。第一章则从横向归纳了大学理念、上海现代大学文学教育和大学环境内的文学活动与新文学的关系。第二、三、四章则分别以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光华大学作为个案，来说明它们面对新文学时分别采取的开放、革新和保守与反保守的态度，及其对新文学造成的影响和相应形成的不同关系与发展态势。结语部分提出一些留待思考的问题。此外，在对这三所大学进行描述时，本文还对比上海乃至全国其他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震旦大学等，在比较中体现出上海现代大学的整体图景和上海现代大学独特的存在。

关键词：上海现代大学 新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9

Abstract

The modern university becomes a main institutional field of the productive process of modern knowledge, after th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was set up. Under this situation, the literature entered this system as one discipline; therefore the literary education evidently affected the literary developing trends. As an important social system, modern university was influenced and disciplined the New Literature, so Shanghai's modern universities were selected to pro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 university and the New Literature.

Because of the new literary curriculum was a significant sign in the relationship, so the history process must be study carefully to general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 university and the New Literature. On one hand, Fudan University, China University, and Guanghua University were researched as three cases to outl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 university and the New Literature. One the other hand, the campus literary activities was also noticed when studded on the relationship. Therefore, the whole study outspreaded on three aspects: 1. the idea of different universities; 2. the literary educational activities; 3.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on campus.

In the part of introduction, the object, the area, and the method of this study were raised up. In the chapter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 university and the New Literature was generalized briefly. In the chapter 2, 3, 4, Fudan University, China University,

Abstract

and Guanghua University were described as case study. The remaining questions were brought forward in the part of epilogue.

Key Words: Shanghai's modern university the New Literature

CLC Number: I209